

叩问与反思:1958 年中国新民歌运动的再探索

孙拥军

(河南理工大学 中文系,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1958 年新民歌运动,是建国以来的一次重要文化事件,同时又是一场内涵极其丰富复杂的全民荒诞造诗运动,对中国诗歌传统,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无疑必将是当代学者们在进行中国当代诗学研究时,难以回避的历史课题。因而,在文学发展的新时期,重新去探讨大跃进新民歌与中国诗歌传统的渊源,及其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将具有更新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中国新民歌;新民歌运动;造诗运动;诗歌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2)04-68-04

1958 年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全民共同参与的新民歌运动,是当代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事件,是一场全国范围、自上而下的大型群众性诗歌运动。虽然在中国诗歌或者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文学的存在,但新民歌运动终究是难以回避的史实,毕竟是中国文学、中国新诗发展到共和国时期,所走过的一段极其特殊的文学历程,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民众心理,乃至文化理念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在文学史上,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影响。无论在新民歌运动开展的当时,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新时期,文艺评论家们都已将“新民歌与中国新诗的关系”分割成“诗歌下放”、“新诗如何向民歌学习”、“何为中国诗歌的主流”、“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以不同的文学期刊为载体,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新民歌的见解,对这场运动做出自我评价。但我们站在新世纪之初,再去回顾这场已经过去五十余年的诗歌运动,必然还会有更多的学术思索,以更加科学的姿态对新民歌及其这场全民造诗运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

无论从什么角度谈到“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1949 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时间点。从史学的角度而言,它是一个

新时代、新历史的开端,翻身、翻心的人们从这个时间点以胜利的姿态,走进彻底改变命运的新时代,并且这些开始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去改变社会、改变生活,从而建构起自我理想的新社会、新生活。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无法脱离它所属的时代而独立发展,它的前进与发展,必然会与这个时代的脉搏紧紧联系在一起。因而,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也必然会受到这种改变的影响,必然会面临新的发展环境。正如学者李新宇所言,从“五四”以来已经形成自我创作传统的中国新诗,在当代新的文学规范和文学体制下,必然会“走上一条非常特殊的道路”,“诗的各个方面都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并“形成特有的艺术规范”^①。诚然,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诗歌,开始了以“歌颂”为核心的大合唱时代,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新时代,歌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从而,颂歌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主题,成为了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旋律。

1958 年的新民歌运动的蓬勃开展,虽源于 1958 年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催生,但从创作主题和思想内容上看,也是在延续和发展着颂歌这一时代主题,并在其开展过程中,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新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8 年,新民歌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与重视,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评价。作为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周扬

收稿日期:2012-04-20

项目介绍:本文是河南理工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重返 1958:中国新民歌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拥军(1978-),男,河南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著文,认为新民歌“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发展的新道路。”^②后在他与郭沫若合作选编的《红旗歌谣》的前言中,更把新民歌上升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的高度,称“在它们面前,连诗三百篇都要显得逊色了”^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各省市党的领导都把当地创作的新民歌,带到会场上宣读。老诗人萧三搜集、精选了其中一部分发表在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并称这些新民歌为“最好的诗”^④;徐迟听过这些新民歌,也谈到“好像一座最丰富的矿藏突然被打开了一样,我们在怀仁堂上听到了最生动、最美丽的歌谣。”^⑤《人民日报》在《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中,肯定“数以万计的工农兵所创作的新民歌,就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样的诗歌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是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诗歌。”^⑥郭沫若也认为“今天的民歌民谣,今天的新国风,是社会主义的东风。这风吹解了任何可能的冻结。人民的心都开出繁花,吐放芬芳”,“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⑦诗人臧克家辑录了报刊上一些群众的创作,称之为“大跃进的号角”。丁景唐将新民歌成为“生产大跃进的战鼓和号角”^⑧。袁水拍在《全国唱起来了!》一文中,开篇就谈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各地涌现了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民歌民谣,内容丰富,气势雄壮,充满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这种群众创作的规模,和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可以说,都是超过了过去的时代的。”^⑨还有的人把这些新民歌称为“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萌芽”。^⑩

面对1958年创作出来的新民歌曾经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殊荣和美誉,我们也承认,在新民歌运动中创作的数以万计的新民歌作品,其中不乏有一定思想内涵、艺术价值的作品存在,各地开展的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新民歌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给后人提供了大量了解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思潮的珍贵文献资料,但这一时期的大量诗歌作品,若要从美学和艺术价值上去评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为“民歌”、“民间文学”的性质。在新民歌的创作过程中,新民歌创作者“以‘工农兵’、‘民间’、‘人民’的名义,彻底否定了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价值观、审美要求,否定了几代诗人创造的文学成就,从而,把新诗的发展引向灾难深重的歧途。”^⑪

二

在已经过去五十余年后的今天,对中国诗歌史上这场罕见

的新民歌运动,究竟如何做出客观评价?它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再次探索新诗发展道路的时候,这必然是一个值得研究,而且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

在新民歌运动时期,全国各地创作出来数量之多的新民歌作品,尤其是运动之处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不乏在内容、形式以及审美风格上可算作较为优秀的作品,但总的来说,这些新民歌作品质量不高,甚至还无法将这些作品纳入文学作品的范围。诚然,我们无法用文学的审美标准和文学的规范去衡量这些新民歌作品,毕竟这些追求高速度、高产量的急就章式的新民歌作品,已经失去了作为文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虽然每天都有大量的作品创作出来,但这已经是完全违背了文学作品的生产规律,但这些作品其实是一种计划创作的产物,在高额计划的压制下,去创作新民歌,毋庸置疑,便可知晓新作品本身的质量。

另外,新民歌作品是一种“应制文学”,或者说“应命文学”、“遵命文学”,是“歌德诗”、“颂德诗”,是文学极力配合政治运动的产物。创作出来的新民歌作品,虽在名义上被冠以“工农兵作品”,并口称“六亿人民皆诗人”,“人人是作者,人人搞创作”,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的所谓文人以工农兵的名义进行加工和伪作的产物。

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在1956年“双百”文艺政策的指引下一度活跃起来文艺界、诗歌界已经受到了沉重打击。“这种挫折从诗人的个人处境波及到创作心理,从艺术的自信心波及到对新诗的发展认识,不能不对下一阶段新诗发展的产生重大影响。”^⑫正如艾青所言,“提倡百花齐放,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没有达到理性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果。”^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诗歌界知识分子对新诗发展所作的艺术探索的收敛、退缩,使中国新诗的创作走向几乎中断。

历经1957年反右运动淘汰之后的精英也就是当时所言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创作出来的新民歌显然是代表了政治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是无法表达也不能代表工农兵真正心声的。这些新民歌已经完全失去了像《诗经》、“汉乐府”等传统民歌的文学意义。中国传统的新民歌作品,都是来自民间劳苦大众在历经真实的生命、生活的人生体验之后,发自内心的情感的流露,表达了真实的呼声,是一种毫无掩饰、毫无政治目的的歌唱,是一种自在、无拘束的创作。新民歌和传统民歌相比较而言,已经完全失去了作为民歌、民谣或者民间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是说,1958年对新民歌的宣传和提倡,已离开了发展新诗的本来意义,而把创作新民歌作为一场

政治运动来开展了,成为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的鼓动工具。诚如作家李广田在云南“万人赛诗会”期间所说“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宵,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⑭

三

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新民歌破坏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发展的正常秩序。“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种成绩也是无可否认的;而且在不断地探索和创作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诗人,并形成了各自较为成熟的创作、艺术风格。然而,在新民歌运动之初,新诗就彻底地否定,被认为长期以来存在严重脱离传统、脱离群众、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因为工农兵“看不懂,听不懂”^⑮,而被排除在诗歌范畴之外。

我们已经谈到的,1957年文艺界反右倾之后,一部分诗人、作家失去了创作文学作品的权利,是失语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因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或者无法失去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文人意识去迎合政治的需要,而逐渐退出文坛,一时成为创作上的失语者;当然还有一部分的诗人们、作家,适应了这种政治干预文学的状况,创作出一些迎合政治的新民歌作品,发出违心的、无奈的声音,致使建国后已经形成的来自不同境况、重新聚集在一起的诗人队伍,再度走向无奈的分化。由此,我们不得不去思索,新民歌运动对作为作家、诗人的知识分子创作命运的干预。诚然,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存在,它的使命就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是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社会感悟和精神体验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作家、诗人的创作,是其本人生命、生活体验的艺术结晶,是其一种自为、自在的创作。新民歌运动时期,所谓的工农兵创作出来的新民歌,大部分是迎合政治的需要,创作出来的急就章式作品。从艺术上来说,根本谈不上是文艺作品,更不用说是作者的人生体验与感悟。另外,从当时来看,政治对文学创作的急剧干涉,无论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学管理机构,还是理论批评家对新民歌创作的无限提倡,毫无疑问都是让新民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成为文学的正统,对五四以来所形成的中国新诗进行打压。也就是说,提倡新民歌,反对新诗。因此,一些从“五四”创作新诗走来的作家,受到了来自延安唱着《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的诗人的批评,要求这些写作新诗的作家、诗人积极向民歌学习,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上山下乡向民歌作者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创作。艾青、蔡其矫等作家创作的新诗作品,被攻击和批评,甚至上升到政治思想

的范畴给予抨击,创作不出工农兵喜爱的作品,被认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就没有很好的贯彻”,“不仅是语言、形式问题,同时,也是作者是否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群众观点的问题”,^⑯无奈之下,这些作家只得虚心向民歌学习,或者长期不语,或者勉强创作出一些四不像的新民歌作品。

从文学的发展来看,中国诗歌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一些知识分子创作文人诗歌作品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生活在民间的劳苦大众创作民歌作品的道路。二者之间本来就是在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共同发展,都创作出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历代相传诵。而且,在文人诗歌与民间诗歌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人去关注何为诗歌的正统、何为诗歌的主流。而在新民歌运动时期,何为主流?何为正统?何为为基础?却成为了争论的核心。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来思索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诚然,每个时代文学都无法脱离与政治的纠结,政治或多或少地都在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如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代的“八股取士”,清代的“文字狱”等等,都对文学、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干预,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有这些历史现象的存在,但整体上中国文学还是在向前发展,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而新民歌运动时期,在政治的干预下,对文学发展的规律和正常机制造成了极大破坏,人为地提倡一种文学,压制另外一种文学,使新民歌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受到歧视。

1958年的新民歌是中国特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下的产物,有很大的创作时代局限性,“它产生于大跃进,服务于大跃进,也推动当时大跃进形势的发展。作为一个诗歌运动,它历经了由自发到人为,由健康发展到泛滥成灾的过程。”^⑰因而,在分析它与传统民歌、民谣,尤其是与“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关系时,应采取客观、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跃进”新民歌,在过度夸张与出格想象的创作意识下,无限夸大的诗歌语言大量充斥在新民歌作品中,过度地渲染了诗歌的浪漫主义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失去了作为诗歌这一文艺形式的应有的功能,即诗歌应是作者心灵世界的真实反映,应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折射和缩影。新民歌在创作中,虽然继承了传统民歌“诗言志”的传统,但过于夸大了对“志”的抒写,将政治、生产口号歌谣化,使新民歌的创作过度地遵从于政治的需要,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八股诗”、“命题诗”^⑱,因而难以达到传统民歌创作中出于创作者真正的生活体验和发自肺腑的自然吟唱。“由此可见,大跃进民歌运动是一个全面地推进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运动,是权

威话语借助民间话语全面覆盖知识分子话语的一个运动。是彻底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而回到民间传统上来的一个文学运动。它意味着知识分子被迫放弃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而向民间大众话语无条件彻底归顺。”^⑩正如学者张炯所言,“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在极‘左’的政治和文艺思潮的引导下,从前期比较健康走向后期的崇尚‘假大空’话和粗制滥造。”^⑪

注:

①李新宇《现代中国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②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载《红旗》1958年创刊号。

③郭沫若,周扬主编《红旗歌谣·“编者的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④萧三《最好的诗》,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

⑤徐迟《人民的声音多嘹亮》,载《文艺报》1958年第4期。

⑥《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14日。

⑦郭沫若《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载《中国青年报》1958年4月16日。

⑧丁景唐《民歌——生产大跃进的战鼓和号角》,载《文汇报》1958年4月17日。

⑨袁水拍《全国唱起来了!》,载《民间文学》1958年6月号。

⑩刘芝明《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萌芽》,载《文艺报》1958年14期。

⑪⑫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第119页

⑬艾青《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6页。

⑭李少群《李广田传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62页。

⑮⑯丁力《诗风杂谈》,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⑰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新诗的现状与展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7页。

⑱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⑲李新宇《“早春天气”里的突围之梦——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载《黄河》1998年第5期。

⑳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新诗的现状与展望》,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

Inquiries and Reflection: the Re – exploration of Chinese New Folk Songs Movement in 1958

Sun Yong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Henan , Jiaozuo 454000)

Abstract: The 1958 new folk songs movement ,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ev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a national – wide incredible poetry creation movement with its extremely rich and complex connotations , produced bigger effects upon Chinese poetry tradition ,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oetry of China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 thus becoming an unavoidable historical subject in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tics by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Therefore , in the new period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 it will be of more academ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re –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folk songs movement in the period of Great Leap Forward and Chinese poetry tradition , the impact it produc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ew poetry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 and seek truth from facts to make an objective , imparti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said movement.